

政治學出版精進研習會會議紀錄

場次一：台灣政治學者的國際出版現況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09:10 ~ 10:4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暨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所長)

報告人：黃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與談人：牛銘實(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德育(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林澤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學系教授)

林正義所長：

各位政治學界的先進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可以參與由台大政治學系主辦的政治學出版精進研習會，這場次我們所邀請的學者都是在國內外具有豐富出版經驗的學術先進，相信一定可以帶給大家許多珍貴的看法與見解。那我們就先請報告人黃紀教授發言。

黃紀教授：

今天很榮幸，來這裡報告台灣政治學者在國際期刊的出版現況。報告的內容大家可以參閱手邊的大綱，此份大綱首先說明資料收集的範圍與程序，然後再檢視過去幾年期刊投稿的趨勢，並也說明了關於國際期刊的 intercept 還有標準。另外，除了篇數以外，當然也要觀察國際期刊的聲望。而國內學者在投稿國際期刊的時候，增加見稿率也許並不是唯一的目標，但卻是一個值得努力我們的方向，這部分我也會加以說明。

這篇報告因為準備時間較短的緣故，無法涵蓋大範圍或上百位學者 而是以國科會提供的二十五位學者，再加上個人主觀上印象上認為值得補充進去的幾位，所以總共包括有三十七位學者，當中一定難免有遺珠之憾，對此我要深深致

歉。而這三十七位學者中，其中又有五位在搜尋論文時沒有達到納入統計的標準，故本篇報告採用的其實只有三十二人。我在論文搜尋的範圍係從一九八八年到二〇〇五年六月，總共七年半的時間，收集了一百二十四篇期刊論文，這一百二十四篇都是出現在 SSCI 的期刊上面的文章。請見講義第二頁。在收集論文時因為要有一致的標準，所以都是以學者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在台灣擔任專任教職時發表的文章為準。故其在國外任教時的發表並未列入，這是在計算論文數目時的一些考慮因素。

目前資料的收集有三個來源：一是國科會提供的各學者著作目錄；二是各學者服務單位網頁上提供的個人著作資料；三則是 SSCI 的資料庫。這三個來源之中的資料要是有不符合的，都會追溯到原始的紙本與電子版。這些學者目前的任職分佈狀況已列於講義上，請自行參閱。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講義第三頁的表二，此處列有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的 SSCI 論文。如果想用這些指標來顯示期刊的品質，則這些指標也許還不夠全面，不過，因為目前並沒有其他標準能衡量國際期刊的品質，所以我在這裡還是把這些指標列出來作為參考。現在，各位可以看看講義的表二 PS90 還有 PS03，因為這兩者的計算方式是與 SSCI 是相同的。這裡也列入衡量標準，對了解期刊的排名會更有幫助。為了讓大家能更容易了解表二的趨勢，請見圖一，就是把表二第二欄所顯示的每一年的篇數，把其收錄的數目計算起來。大致來看，投稿的趨勢是增加的。其中有兩個高峰，是一九九六年與二〇〇四年，這兩個特別的高峰很值得注意。

看完篇數，回到講義的第八頁與第九頁。我們再探討過去幾年，國內學者期刊論文發表的分佈狀況。請看到第八頁表三之一，各位可以發現，發表的期刊是高度集中。其中《問題與研究》(*Issues and Study*) 在這幾年間，此三位學者就發表六十六篇以上，佔全部的 53.23%，倘再加上 *Asia Survey* 就有八十篇，佔六成四的比例。有七成的論文集中在前三本期刊，就期刊的分佈而言，這是極高度集中的狀況。接下來，表四之一與四之二解釋這些發表出來的文章是由單一作者還是共同寫作。在全部一百二十四篇中，有四分之三由單一作者發表。然後，我也針對 intercept 的部分作整理。除了篇數之外，當然，我們也要看看期刊在學界中受注意的程度，因為論文發表在期刊的目的就是希望世界能更了解台灣政治學界的動態。再來，我也針對期刊在學者心目中的排名作整合、排序。表二後面所看到的結果，顯現出不太一樣的走勢。為何會有這些差異？等會兒可好好討論。如

果用這些資料做了一些分析，就是各位手上第十一頁上的這個表。這個表把資料分成兩個不同層級，我們可以發現，在 SSCI 上發表的文章，有將近一半是共同發表的。

這裡可以做個小結，國內政治學期刊發表有三個明顯的趨勢：第一是發表的人非常的集中；其次，發表的期刊也非常的集中，集中於台灣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相關問題；再者，就 impact value 這一點，共同寫作扮演重要的角色。針對這三個趨勢，在這裡有幾點建議。做學術研究一定要長期的耕耘與投入，既然往國際期刊投稿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在這裡就要提出幾點策略。首先，就中期來看，可以嘗試以組成學術團隊的方式來投稿，不然一個人單打獨鬥，是比較吃力的，如果團隊裡面又有國外任教的學者的話，相信會更有幫助。就長期來看，當然是要培養國內年輕的學者投稿的意願與能力，因為向國際期刊投稿，的確是有先天的語言鴻溝要跨越。最後是議題方面，目前的狀況是議題十分集中，但是可以試著開發台灣特有的，受國際注目的新議題，作為努力的方向。

林正義所長：

非常感謝黃紀教授精闢的報告，大家一定獲益良多，而且剛剛提到的建議應該還是一連串的行動而不是單一的行動，可能以後出版不僅僅是影響每年十二月底的個人研究計畫，包括團體的計畫也會被影響到。接下來我們再請林澤民教授發表一些看法。

林澤民教授：

請看 PowerPoint 分析圖表。在此我所要做的分析不同於剛才黃教授的分析角度，因為黃教授已經對國內政治學出版狀況做了一個很清楚的報告。現在，我的角度是要從台灣研究這一學門在過去幾十年的出版狀況分析。至於為何要從台灣研究的角度來做？因為大部分的同仁都是從事台灣研究，此外，國外學者做台灣研究的也不少見，所以如果把這些國內國外的學者都集中在一起探討，應該能得到有意思的結果，而這些探討應該可以作為未來出版時的建議。

這份報告取樣的標準是根據 GS2003 所做的排名，取前面六十名的期刊。這是個人主觀的取決，因為這次研討是以精進為要求，所以自然以排名較前的期刊為主。另外，再以 SSCI 為目標來找尋 GS2003 與 SSCI 之間的交集。現在請大家

看投影片。在 SSCI 搜尋時，是以台灣為主題來搜尋，於是從一九七五年到二〇〇五年的論文刊登趨勢，我們可以看到有顯著的增加。至於為何一九九六年與二〇〇〇年有顯著大量的文章？這一點並不清楚。這裡還要補充的是，在搜尋範圍的七十種期刊，有些並不一定是政治學的範圍之內，可能是經濟學或是社會學的。但是這篇報告也一併將這些期刊納入計算範圍。

再看下一個投影片。在與台灣有關的期刊裡，大家可以看到，刊登最多關於台灣的文章的是 *China Quarter*。光這一本就佔了全部統計文章的三分之一。就像剛才黃教授說的，論文投稿範圍有高度集中的現象。這個資料應該可以讓大家可以了解，國際頂尖期刊有哪些是比較容易接受台灣的文章，可作為大家投稿時的參考。另外，這裡有一個文章被引用的平均數目要說明一下。雖然平均被引用的次數是 3.8 次，但是這個數值其實是失真的，因為有些熱門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因此把平均值拉高。全部的一百一十五篇文章之中，發表單位當然是以台大最多，有三十六篇，其次是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再來則是中正大學。大家可以看一下表二。接下來大家看表三，列出的是作者的國籍，大部分的學者還是來自美國，台灣則佔了百分之二十二。因此台灣的學者即使在關於台灣研究的部分，仍不算多數。這裡就先提出這一部分的資料，在下一場應該可以就這一部分作更深入的策略探討。

林正義所長：

謝謝林教授的發表，他的分析跟剛才黃教授在研究上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分工。現在請牛銘實教授發言。

牛銘實教授：

大家從事學術研究，都希望研究的成果能給大家分享。其實就我個人的感覺，台灣的政治學術界的表現這十年來已經越來越有突破，對於繼續往上發展，其實是前景光明的。相對於香港學術界的沉悶，大家應該為此感到驕傲。在這個有活水的基礎上，大家應該要問的問題是：如果今天沒有國際期刊，或是只有 TSSCI；我們寫的文章到底有沒有被保存的價值？有沒有信心寫出好文章？學術研究其實是種競爭，當然是良性的競爭，不過只要競爭就要分出好壞，要判斷好壞其實要建立一個全面的機制，而不是只依賴 SSCI。

我在杜克大學待了十七年，該校從來沒有用 impact factor，或是以在 SSCI 期刊上發表的篇數做為評斷升等與否之依據。台灣的狀況，照黃教授剛才提到的就是發表之議題有集中的現象。其實社會科學並不同於自然科學，難免會有地域性的限制。比如這幾年我嘗試用中文寫作，發現在大陸與台灣的政治學研究有很大的差異。也許這是因為大陸當局不允許下載文章的緣故，台灣的政治學界相形之下限制少了很多，討論積極與學術進步也迅速很多。所以這幾年有關台灣選舉的文章之所以激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政大選研中心將研究資料公開。這種公開的氣氛，就是造成研究進步的重要因素。最近幾年，我也與政大選研合作了一個公開的資料庫，就是抱持著這種開放的精神，希望能對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家有所幫助。

除此之外，我還希望國科會可以持續舉辦一些小型的專題研討會，而不是一次辦一個大型的研討會；那樣上百個人聚在一起，這樣只是像放煙火一樣，燦爛，卻沒有持續效果。

林正義所長：

時間緊迫，所以緊接著是不是再請王德育教授發言。他現在是政大的訪問學人，而且有著編輯國際期刊的豐富經驗。謝謝，請王教授為我們報告。

王德育教授：

好，我就簡短地表達一些看法。首先，我非常同意剛剛牛銘實老師的說法。近期台灣公開資料庫，對研究的幫助是非常地大的，尤其是對台灣當地相關研究方面。所謂增進國際出版機會，其實說穿了就是要培養一個環境、一種文化，讓年輕的學人更有發表文章的機會。建立文化與環境則需要制度的配合。這一年在國內，我看到國內的學者一方面要兼行政工作、一方面要進行教學工作、還要繼續做研究，這幾乎是超人的工作量。這就有必要從制度面開始改變政個環境。也許可以從長遠的觀點來出發，看能不能從薪資還有稿費上開始檢討，幫助未來學者長遠的發展。這樣就能在制度上幫助國內的學者有更好的研究空間。另外，如果把對台灣的研究放在研究中心，那麼在研究出版方面會比較有效率。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林正義所長：

謝謝王教授。關於這場討論黃記黃教授做的研究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到今年二〇〇五年我們在國際出版的數量有增加的趨勢。而這場研習會目前所做的只是對於現狀之檢討，下面的幾個場次會更進一步討論政治學門的出版策略。接下來剩十分鐘請大家提問。謝謝，楊永明教授請說。

楊永明教授：

聽過剛才幾位老師的報告，如果根據我自己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有三個層面值得思考。

第一，專書與 book chapter 其實都應該要納入國際出版的考量，而不是只考慮期刊論文。因為專書與 book chapter 在學術方面的要求並不亞於知名期刊。另外，關於智庫的出版品，其實也應該要納入國際出版的研究範圍，這裡是指學術性的智庫。學術性智庫出書的學術價值，其實與期刊的學術專業要求是不相上下的。所以智庫出版品也可以作為增加國際出版的可能出版途徑。

第二，就像是剛才黃紀教授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趨勢，因為出版議題高度集中，非台灣議題或是國際關係在這一方面的上要出版是有其困境的。

第三，台灣的學者面臨三方面的要求：教學、研究還有社會服務。這在某方面會降低學者研究的品質。就社會服務而言，像我個人先前曾錄製公視的節目，這樣對社會付出十分多的心力，卻沒有辦法納入評價的標準，這是不是也值得進一步再做規劃？

林正義所長：

這方面的問題是不是請黃紀教授做個回應。

黃紀教授：

的確，應該把專書與 book chapter 納入考量。然而因為準備時間緊促的緣故，在一些標準上就難免有疏漏之處。不過這其中比較大的問題是，期刊行之多年比較容易有客觀的評量標準；專書固然有些學術水平不相上下，但是畢竟沒有那麼容易加以評價，所以研討會的報告未被納入也是基於相同的考量。

林正義所長：

好，現在請林澤民教授最後再做個補充。

林澤民教授：

其實許多新的標準也一直在出現，像 google scholar 就是一個大家可以試試看的新途徑。透過這個途徑，可以很輕易地查出學者個人專書還有著作被引用的狀況，未來或許這也是評量上可以採行的新方式。

場次二：國際出版策略之探討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11:00 ~ 12:3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暨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丘昌泰(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

與 談 人：牛銘實(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德育(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林澤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學系教授)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

丘昌泰所長：

身為政治學者，出版國際刊物很重要，可是這也需有制度的配合。就以台北大學為例，每位新進教師，平均至少要上五門課，還有碩士在職專班的課也非上不可，進修部也必須要上。因此一個人就要應付七門課，於是眾多學歷優秀的新進學者就往往為了應付教學之需要而搞得面黃肌瘦。這不是因為要寫國際出版論文，而是因為教學責任，結果當新進教授好不容易熬成爲資深學者時，理想與研究熱情其實早就被榨乾了。這場次我們討論的是國際出版，所以不見得眼光一定都要朝向英美，專注在亞洲特定的領域，建立起高聲望，自然也會有國際化的知名度。看來與談人幾乎都是上一場的老面孔，現在就先請王德育民老師發言。

王德育教授：

大家好，今天主要報告的是關於自己在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期擔任編輯還有審稿人的經驗。希望與大家分享我審稿的心得，談談國際刊物的審稿策略。審稿制度代表著一個制度上的懷疑批判機制，因為學術研究是必須要帶有懷疑的。作爲一個學者，就是被訓練著要具有懷疑的態度，其目的是爲學術研究的產出做品質管。從期刊的觀點來看，也是要避免出版那些沒有出版價值的文章。故通常期刊的退稿率大約達八成，所以說投稿然後又被退稿的遺憾是在所難免的。

審稿制度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學術期刊的匿名審查是一種集體責任制，這種同儕之間的審查通常關注幾個問題：你的研究問題是否重要？在方法上面是否適當？文字上是否流暢？結果是否合理？所以審稿人的意見會深切影響文章的採用與否，編輯只能起邊際的輔助作用，扮演的是中間的角色，最主要的還是審稿人的意見。在瞭解審稿人的角色之後，有幾點給大家作參考：第一點、你的研究問題是什麼？這決定了你投稿的對象。第二點、建議大家從頂尖期刊開始投稿。雖然頂尖期刊的退稿率高，但是一但能夠獲得採用，其帶來的效果與影響都會相當驚人。第三點、雖然在最後付印的時候，註腳可能不會刊登出來，但是在初稿中一定要詳細列出，這樣才能取信於審稿人。另外，參考書目也必須要完整，重要學者的文獻也必須要放進去，尤其是審稿人本身的文章。再來要盡量減輕審稿人的負擔。所以說關於你要研究的問題，要盡量明顯的把問題標示出來，減少審稿人閱讀時的理解時間。還要記得要做摘要，這樣才能夠讓審稿人加速進入狀況，也可以減少編輯的負擔。最後，在投稿時切記要遵循該期刊的要求，比如頁數或是格式都要符合需要才不會因為格式的問題被刷下來。

至於手稿要如何讓審稿人印象深刻呢？我相信大家對這一點都有豐富經驗，這裡就只需簡單的描述一下。第一，研究問題要清楚。可以用問號，或是整段強調，來協助審稿人了解你引用理論的顯著性。第二，用詞遣字要流暢。要讓整篇文章能夠給審稿人一種整體感，跨越文化與文字的限制好讓審稿人了解你要表達的意思。尤其要注意研究的主題與當下的潮流是否吻合，以免不知不覺中顯現出差異與隔閡。第三，如果你投稿的是量化的稿件，資料分析的敘述要能夠以短文的方式呈現，使用的統計數據則要盡量整理成表格，另外在正文部份的話，盡量不要使用太多數字，而是要詳盡的以文字解釋數字背後的意義。能做到上述這三點，相信你就能完成一份相當不錯的手稿。最後切記你的發現要與你一開始問的研究問題相關，關於決策與理論的應用也必須要與發現還有研究問題作有邏輯的連結。

一開始我就曾經提到，期刊的退稿率達八成，所以一旦你的心血結晶成了退稿，該如何面對呢？我給大家的建議是：不要沮喪，也不用因此感到挫折，畢竟以退稿率而言，被退稿幾乎是每位學者都難免會有的經驗。這並不代表研究的成果被否定，也許只是審稿人之間的意見不合，甚至也只是因為格式問題。因此，被退稿時收到審稿人意見，可以成為再次修正原本論文的良好參考，這也會讓

你下一次投稿更清楚文章要進行的方向。何況山不轉路轉，修改過的文章可以再轉投其他期刊，也許會有轉機出現。就把退稿當成是一個人生經驗就好。

如果收到審稿人的修改通知，或是意見與審稿人不合，要如何因應呢？你可以寫封信讓編輯還有審稿人了解你的看法。不用害怕與編輯或是審稿人接觸，這樣反而是一個增進雙方了解的機會。不過要記住再用字上要保持謙虛有禮的態度。最後，關於語言問題。因為英文畢竟不是我們的母語，所以在撰寫文稿時，可以用的解決方式有：先請英文母語的專業人士讀過你的文稿；或是與母語是英文的人共同寫作。這些都是比較可行的解決方式，建議國科會可以就這個需求，適當的給予補助。以下的兩篇文章，可對我的發言有補充之作用，請大家參考：Patterson, Samuel. 1994. “The Itch to Publish in Political Science.” 收錄在 Rita J. Simon and James J. Fyfe. *Editors as Gatekeepers* (Lanham, Mar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3-19。另外，Caputo, Richard K. 2004. “Advice for those Wanting to Publish Quantitative Research.” *Family in Society*, v.85, no.3: 401-404

今天報告到此結束，謝謝。

丘昌泰所長：

謝謝德育兄的發言。我在這裡先整理一下他剛才發表的重點。第一是期刊的選擇很重要；第二要遵循期刊對投稿文章的要求；第三是引用文章與註腳使用要完整；第四則為方法論的問題，包括要提出好的研究問題。第五，在面對退件與外審意見不合時要注意因應。接下來我們再請林澤民教授發表意見。

林澤民教授：

謝謝主持人。在此我就針對上一個場次中個人所提出的部分，尤其是關於台灣的研究現象，以及對國際出版現況做更進一步的說明與討論。投稿方面王教授已經講了很多，所以此處就不多談。在上一場大家可以發現，關於期刊論文的排名，被我刪了將近一半。為何要做出這樣子的決定，其實也是有原因的。這些雖然都是很好的刊物，但是我認為刪除掉的期刊，例如說 *Asian Survey* 這些區域研究類的期刊，其能大量發表關於台灣的文章，到底是天經地義的，倘研究台灣的文章無法被接受，那才是有問題。所以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有關台灣的文章是很好，但是卻並不是這研習會所討論的重點。像之前曾說到關於台灣研究的文章在

其他國際期刊的發表上是有困難的，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要轉而發表關於研究美國的文章，甚至是德國或法國的文章，而是代表大家有必要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突破區域研究的限制。

關於突破研究領域的限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題材的選擇，可能不能夠只是專提台灣，至少要做比較的研究。我知道我在國外任職的學校裡，其實有不少同仁都對關於台灣的題材有興趣；所以今天如果作一個台灣的研究，能夠與國外的相關現實結合，做一個比較，那可以引起些重量性的刊物更大的興趣。舉例說我最近就審到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人，他就是比較台灣與墨西哥在兩千年總統大選，執政黨失敗的情形。除了與其他國家作比較以外，可以試著提出新的理論，而不只是增加對台灣的了解，或是補充關於台灣研究的案例。因為一般而言，關於台灣的研究還有案例，是很難在國際間引起廣泛的興趣的；不是說專講台灣的文章不會被接受，但是要對除了台灣文獻研究的其他方面也要提出貢獻。也許這個理論不是能立刻應用到其他國家的其他現象，但是在驗證的過程中，對建立學術聲望與權威就有很大的幫助。比如最近我進行的一篇新文章，雖然內容還是以台灣為主，但是因為這篇文章裡面提出了一個新方法，所以只等了半年就被重要期刊接受了。這裡就要提出這個途徑，做為大家發表文章的參考方向。不要只是把範圍侷限在台灣，而是要把方法模式都試著超越台灣的範圍，這樣比較能增加被期刊接受的機率。

再舉一個例子，台灣有不少人喜歡做與經濟研究有關的案例分析，這種研究坦白說是很難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引起共鳴的。因為台灣的案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現象是不一樣的，不過，卻可以試著找出與台灣比較有類似經驗的國家來做個比較。例如可以在一篇文章中討論比如說把台灣與韓國一起提出來討論，最後再與美國的現象作比較，再討論相似與不相似時，就可以提出一個可能的理論，那這樣在投稿時就比較容易得到共鳴。

最後，我要回應剛剛黃紀教授提出的策略，那就是與國外學者一起做研究。這點我提出一點意見與看法，其實合作並不一定保證能增加被期刊接受的機會，不是遠來的和尚就會念經，或是認為找一個外國人掛名便能讓文章的發表被接受。合作研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讓不同專長的人彼此之間截長補短，從別人的眼光之中，比較有可能發覺自己在研究方面的不足。最近我就審到一篇與中國大陸研究有關的文章，討論農民抗議的運動，研究政府與農民在互相對抗之中會採

取的策略。我發現這篇文章其實如果能採取不同的研究角度，會有更有深度的結果，但是卻也不可能因此叫作者從頭學起。這時候如果能夠合作研究，就可以依狀況與專長採取不同的研究角度，讓研究成果更豐富，也能夠增加文章被發表的機率。比如說在國外的學者往往希望能夠與國內學者研究，這樣能夠補足國外學者對國內情況的陌生，增加文章的深度與發表率。我這邊想要提出一個方法。合作其實是要兩相情願才能兩全其美的，所以，幾位志同道合的學者其實可以試著成立一個工作坊，定期聚會，提出文章，然後給彼此一些批評與建議。這應該也是國科會絕對可以贊助的運作模式。這個工作坊也可以定期邀請國外學人或是知名學者來提出意見，相信會更有幫助。

另外關於刊物的選擇，上一場我提出的排名表應該可以幫助大家做選擇，那份表格可以使大家明白哪些刊物較可能會接受台灣的文章。不過，在投稿的時候也一定要注意關於文章的修改。儘管各位在寫一篇文章的時候，一定是已經先有一個預設的概念，所以審稿人的修改意見，往往會跟你本來的研究概念格格不入。我想關於這種隔閡是一定要克服的，要設法把它整合成一篇文章，如此才有可能再被接受。

丘昌泰所長：

謝謝林教授。接下來的時間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就請嚴震生老師發言。

嚴震生研究員：

好，我把握時間說幾個重點，談到關於國際出版，第一點就是要明白當前研究的題目在現在這個情勢下重不重要？除此之外，它還要符合你要投稿的期刊的徵稿範圍。第二點就是在試圖以英文投稿的時候，至少要有以英文作流利表達的能力，我個人在審稿的時候常會遇到連英文都說不通的文章，這一定是不可能採用的，也是種 insult。第三點，應該試著開拓研究的新領域還有新的研究方法，不然想要在舊的領域求突破是越來越困難了。第四點，必須知道使自己做的研究與你所處的區域有相關性，這樣才比較有可能得到最新的資料，做最深刻的研究。關於研究主題，我建議不要經常轉換，除非你已經在先前的領域裡累積眾多著作，已成為公認的專家，這樣才比較有可能拓展到新的領域或層次。

接下來回到剛剛主持人提到的問題。在台灣的學者常常要面臨多方面的要求，以致於很難專注於研究的本職，這是需要進訴從制度面加以改善的。其實可以建立一個制度，補助新進學人出國一年，切斷一切在國內的眾多義務，其實對研究是很有幫助的。而在提高國際出版方面，我們還可以試著創辦一個國際性的刊物，先解決資金的問題，再設法邀請有名望的學者來進行發表，開發出有意義的研究議題，如果前述問題都已解決，接下來就會面臨一個管理的問題。另外，在臺灣要做國際出版，還要面對編輯的問題，因為編輯其實並不只是把英文改一改而已，從文法與斷句都要要求的，這樣才能確保刊物的水平。

因此，台灣實在有必要建立一種學者分工的制度。因為每位老師都有不同的專長，有些適合作研究，有些卻是很好的教學者；現在的制度讓每個老師都要同時兼顧教學與研究，這是一種對於人才或人力資源的嚴重傷害！透過分工，可找出有志於編輯工作的學者，透過集體的努力和產出，才能奠定台灣政治學界在國際出版的地位。

丘昌泰所長：

感謝嚴老師珍貴的意見。那麼我們請牛銘實老師發言。

牛銘實教授：

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享受其中的過程。因為研究其實是一種長期的耕耘，而要能夠長期不斷的研究與付出，則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是很重要的。從前在杜克大學，研究生與教授喝啤酒的次數與之後畢業之後的出路好壞成正比。因為一個研究人不能只關在研究室內關心自己的肚臍眼，而是要走出研究室進行腦力激盪，也可以藉此更了解自己。有時候做研究並不是一定要得到一個確定的結果，往往最大的樂趣是來自研究的過程，在互相鼓勵與提攜之中大家都可以得到成長。

提高國際出版其實治標而不是治本，要能夠營造一個利於研究，樂於研究的環境，研究者才能夠持續不斷的有大量的優質的產出。台灣的政治學界相較於大陸的學者有一個很大的優勢，那就是關於政治學的歷史觀。大陸目前的情形是，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歷史，通常是呈現一個斷裂的認知，不僅缺乏一個完整的歷史觀，而且也無從瞭解，就這一點來說，台灣政治學者相較於大陸政治學者實

在有太大的優勢。台灣學者可以試著多去了解中國大陸這個領域，以同文同種卻又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塊有待開發的領域，相信更能做出不一樣的、與眾不同的研究。

丘昌泰所長：

感謝牛教授啤酒與研究的發言。由於剛剛比較晚開始，再加上這場與談人都個個經驗豐富，暢所欲言，因此討論的時間其實已經超過了好多好多，相信大家肚子都已經十分餓了吧，那麼我們這場次的討論就先到此告一段落。各位與會的先進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藉中午用餐的時刻多加交流，我們下午也還有兩個場次，分別是針對研究與出版，以及台灣政治學界的出版現況加以討論，歡迎各位繼續參加，我們下午見。

場次三：出版與研究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14:00 ~ 15:30 pm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暨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所所長）

與 談 人：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江宜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主任）

黃 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廖達琪所長：

謝謝大家，今天非常感謝台大政治系蘇主任細心規劃這場研習會，我接到主持本場次的訊息時，其實非常的惶恐，因為政治學的出版與研究的主題實在是可大可小，不過，看到坐在台上的其他與談人這樣堅強的陣容，我相信這場次一定是精彩可期。好，由於我們已經晚了大概幾分鐘才開始，所以現在是不是請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所所長吳玉山教授先發言，謝謝。

吳玉山主任：

今天來參加這個研習會，其實心情相當的複雜。謹將個人對於目前政治學出版與研究的一些看法在此陳述，其中有些或許超過了這場會議本身的範圍，但是，希望可以達到一些拋磚引玉的效果。

以往從我做學生開始，心目中理想的學者，或說教授的形象主要有兩種，一是教書教得非常好，極受學生景仰，再者是能寫出那種皇皇巨著，流傳後世。然而，現在這些 model 恐怕都不是太理想的，因為如果你花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就會沒有時間去產出文章，同樣地，如果你皓首窮經，花個幾年才寫了一兩本著作，人家會認為你拖跨了整個系的生產力。

而現在的 model 是什麼呢？它是一種服膺於市場使用者取向的 model，這是源自於理工、生化科技等具有下游市場之學科的 model，它希望上游的研究可以

跟下游的生產結合在一起。可是，政治學並不是一門可以這樣簡單套用此模式的學問，我們比較跟真實的市場有所距離，政治學知識的產出是屬於公共財，沒有所謂的市場來告訴我們哪些研究是重要的。基於這樣的緣故，所以大家爲了做出比較，以及方便分配資源，因而創造了「模擬競爭」。所以如何以可量化的、在國際上具有公信力的標準來替大家排序，就變成一門分配資源時相當重要的工程與前奏。是以，在各種拿捏取捨之下，國際期刊之發表便成了最重要的指標。儘管它其實就是在國際期刊發表的篇數和它影響力指數相乘之結果，然而卻是 the only game in town，而現在大家都已經在此 game 裡，當然，今天這場研習會的目的正是要教我們如何在這 game 裡面玩得更好。

雖是如此，可我們是台大，我們有這個責任去思考它應否該是絕對的。台灣是個開發中國家，特徵就是錢是往公部門集中的，所以公部門怎樣決定分配資源就亟需一套排序標準。那套標準曾讓政大的學校排名難堪過。舉中研院要向立法院爭取預算爲例，爲了讓你知道我表現的多好，必須讓你知道我有在國外期刊發表多少篇文章，我有多重要。所以，這東西是用來爭取預算用的，不管是中研院或大學都一樣，而許多國家同樣也都往這個趨勢發展，尤其是那些學術上的開發中國家，這在已開發國家見來是相當奇怪的。但當今這個 model 已經希望培養我們成爲學術企業家，要瞭解自己生產位置在哪？生產策略爲何？故所有的升等、研究設備、研究經費，可說全部已與個人的 publication 纏繞在一起。

於是乎，學術工作者將錙銖必較，仔細鑽研哪些議題的發表可以效益最大。我這樣講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惡，只是客觀的陳述。那麼，我們就來想一想，如果你已經在這個 game 裡了，要怎樣玩得更好。做爲一個企業家，你首先應該做市場調查，瞭解 SSCI 中每份期刊的方向，以及何者可以比較容易投進去，重點讓你的產品可以賣出去。不過，這當中每個人都會面臨的是：如何把在地化的生產要素轉換爲國際市場會接受的產品？因爲國際期刊裡想討論的議題是要能使大國加分的，討論的是大國關心的事。上午也有人提到可以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但我認爲要跨越這道鴻溝，仍舊必須考量到國際期刊需求屬性，以及我們自身能提供些什麼。在此，提供一點個人建議，你所投稿的內容應是除了對於這個大環境的關心以外，還要屬理論適用性較廣闊或具有比較性意涵的東西，這樣可能會是最便捷的方式。例如台灣的政治經濟在民主化時的轉型、台灣的族群政治、台

灣的總統選舉等，這些都是立基於台灣，但在理論上又可找到比較性較寬廣的議題。

最後，還是要說的是，我十分懷念學生時代景仰的那種老師形象，那種關心學生，一生留下一兩部傳世之作的學者典範。或許現在我們之中已經有人可以漸漸脫離這個 iron cage，但絕大多數想必還是在此 cage 裡面，那麼，我們就好好地做一個 productive academic entrepreneur 吧！

廖達琪所長：

吳老師語重心長，感慨甚深，打個比方，現階段這個 cage 最後頂多只能讓大家練成丐幫，成為徒子徒孫甚多的人。但是要成為獨樹一幟的武功，像是這個東方不敗一樣，那麼可能必須要先自宮才行。好，這個是玩笑話，我們再請台大政治系江宜樺教授發言。

江宜樺教授：

今天這個題目蠻好的，不只談出版，也有研究，但是如果把我放在這裡，恐怕是不妥的。其實先前我在國科會規劃這個制度的時候便已交換過意見，並且對於制度背後隱含問題深感憂心，也曾經強烈批評過。所以我認為我沒有辦法提供什麼出版的建議，但是，我想主辦單位的用意可能是想找個沒有出版過任何 SSCI，也沒有太多著作，但是還在學界存活的人來談談，以供大家探討不按照遊戲規則的人是否還有生路可走。

當國科會想規劃精進出版的研習會時，我便對於這種既定一個方向的出版方式持懷疑，因為我覺得出版的目的應是要基於研究才有意義，而我今天來此，主要也是因為這場次談的不只是出版，還有研究。出版的目的，在當前的這種制度下，變成了只是要爭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次數，出版變成是為了在學術圈生存下去，而不是研究。我自己跟吳玉山老師一樣，從學生時代就存有一些理想，想當一個讓學生肯定的老師、一個讓我的同仁也肯定的研究者。所以，如果可以在我的學術生涯裡寫下那麼一本、兩本或三本自己還算滿意的書，那麼，我便是算對於自己的時代有了交代。因此，我認為出版應該是跟著研究而來的，我重講一遍：是先有研究，才會有出版。

如果有這麼一個時代，大家都在想怎樣出版，卻沒有人想怎麼研究，那麼這個時代一定有問題，因為它本末倒置了。這個時代的出版是爲了讓你能夠生存下去，而不是因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所以想去出版。從做思想史研究的觀點來看，歷史上許多重要的思想家，他們在研究與出版之間其實會拖蠻久的，像萊布尼茲等。當然，或許是礙於當時的環境，也可能是政治或宗教考量，很多人的東西要拖個三五十年才會出版，不然就是死後才由其家人拿來出版。只是我認爲研究之所以可以拿來出版，應該有兩種原因：一是我們認爲研究已達某種成果，可以拿出來獻寶了；另外一種則是研究獲致階段性的完成，所以將其成果出版，以瞭解市場的反應，進而做爲修改時的參考。但是絕對不該有現在這種制度的壓力，因爲這種壓力來時，許多研究的本質與理想都會扭曲掉。

至於研究到底是爲了什麼？第一種答案是認爲能提升教學的品質，我在此則不同意，因爲如此一來則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們則頓失其研究意義。第二個可能的答案是，研究在於幫助人類解決他們的問題，不管是疾病、天文、犯罪。然而，這對許多研究十五世紀，或研究早期社會的人，他們要如何去回答國科會或是其他人所問的能否精進建設的問題？他們是回答不出來的，但這些研究又真的毫無意義嗎？所以，我認爲第二個也不是研究的真正目的。第三個目的，是讓你還算是一個學術界裡的人，你研究出版的越多，就代表你越卓越，就像對一個打籃球的人，我們會希望他能跟麥克喬丹一樣傑出，所以在研究上，我們會希望你是拿過各種國家講座的人，因此，研究是爲證明你比別人傑出。然而，我也知道，哪種境界只要極少數人才能達到。因爲無法認同研究是爲了上述三個目的，所以我提出一個想法，那就是，研究是爲了幫助我瞭解，這個我想瞭解的世界，而這種觀點恰好也與無數我見過的西洋哲學史人物所曾講過的一樣。

人只要對外界有興趣，有問題意識，都可以做研究，問題可以大至人類全體，小則爲一個社區，每個人都可以做研究，學校不過是把一群以研究爲職業的人集合在一起而已。很不幸的，現在我們國科會的制度並不管你的研究是否成熟，逼著你出版，他要求你的形態必須要是論文，不能是專書，不行用中文發表，一定要用外文在外國期刊，而你也不能用義大利文發表，你一定要用英文，因爲只有英文才是外文，其他的文不是外文。如果不這樣，你是無法證明自己做過研究的。我跟吳玉山老師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不打算跟它玩了，我打算繼續做小時候看過的先人那種典範，用一輩子的時間跟它賭賭看，每一本我都只用中文，以書的

形式來做，運氣好，能流傳下去一兩本，便沒有遺憾。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所認識的洛克、霍布斯等人做的，我不是從什麼期刊上去認識他們的。而如果這樣，我卻要付出慘痛的代價，被掃地出門，我也認了。現在國科會逼著我們一定要用英文發表，爲何不就讓大家出版一兩本用中文寫得好的書，五年後、十年後，國外人家也許會想把它翻成英文、德文、義大利文，這不是更好？

很抱歉，佔去了這麼久的時間，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謝謝。

廖達琪所長：

謝謝，從江老師的談話裡，我隱約聽出他似乎有成爲東方不敗的可能性。聽到他很多的感慨，在此我們也期望他不要掉入自宮的命運，不過，現在的武林應該比較人性一點，還不至於會弄到這樣慘烈。我們下一位請號稱學術界的頑童一石之瑜教授發言，謝謝。

石之瑜教授：

我可能是東方已敗，不是東方不敗。我的看法比江老師更激進，我認爲發表與研究是兩回事，現在這個制度逼得你爲了發表，所以要去研究，像五年五百億，我曾跟系主任及許多同仁反映是不是可以不要了，那麼我們就不用提計畫，但是很多同仁都表示有其難處。我這裡主要想談的是，發表跟研究這兩件事情該不該掛勾？像國科會可能會認爲，如果大家認爲 SSCI、TSSCI 不好，那麼你們是不是可以自己想出一個方便我們評鑑的標準，其實這樣想就是整個思路還是把研究掛在發表上，這整個思路是倒掛的，因爲如果研究的目的是爲了出版，那變成是個技術性的問題，整個誘因機制都不同。這促使知識分子間、師生間的關係改變，學生變成是我生產的工具，而我面對校方時，我又變成一個搖尾乞憐要經費的論文生產者。國外剛回來的學者，我們會馬上促使他去發表，而他與學生的關係就立刻成爲工具性的，儘管他們年紀相接近。

所以，其結果會變成，學生成爲一種生產的工具，而學校又成爲我資源與身份地位的來源和象徵。因此，對於任何人拿了錢來叫我做研究時，我便無法拒絕，有人跟我說，石老師你可以說不，但我不能說不啊，因爲我在這樣一個領導位子。其實，這是因爲一個人已經沒有自己做研究時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也沒有研究

的目標，那麼也就不會知道拿錢給他做研究或發表的人，這件事本身到底對不對。由於你做研究，已經沒有基於自己自尊跟人格，你和學生一起做研究，已經不是基於一起追求知識與提升人格。

所以，我也在思考，什麼樣的老師，會需要有人拿著錢去引誘他？或是拿著升等的威脅去壓迫他才會做研究？我想出來，那是一些專門會亂搞的老師，什麼樣的老師會亂搞？就是那些教育部、國科會不給他資源的學校，所謂二流的學校。所以他們要想出亂開一些在職專班、出考試題目、改考卷、到處兼差等弄錢的手段。因此，我認為，研究應該與發表分流，這種以發表為導向的研究，不如讓那些二流的大學去做。譬如，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當中，其中一百億全部撥給二流大學，凡登一篇 SSCI 的文章就發五十萬，這樣我們五年後就會有「兩萬篇」SSCI 的文章；其他的四百億，我們就撥給幾所一流大學專心做研究，但是研究的成果是沒有像登 SSCI 一樣有獎金的，換言之，如果你想賺錢，那就請到二流大學，這樣做一個分工其實也很不錯。

再者，說到出版，也許自然科學、經濟學的人聽到我講那些話可能會認為政治學者就是因為沒辦法發表 SSCI 所以才會這樣講，但我覺得我們只是期盼以比較高的道德標準來看待自己。對於出版的品質而言，其實政治學界也需要發展一套審研究計畫、審期刊或審稿時應有的倫理，而這也能使我們政治學社群的人格可以提升，讓我們在面對自然科學、經濟學界時，可以理直氣壯，讓他們知道我們並非他們所想的那樣的人。雖然這裡面其實牽涉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不要讓自然科學界知道其實我們根本不玩這個 game，還是說應該要有個熱身期或準備期，就是我們自己先有一個 group，先發展出某種政治學界寫稿或審稿的規範模式，然後在漸進地主導這個 game，或脫離這個 game，但現在不要直接去對抗國科會的制度。

我們自己也要建立正確的觀念，明白那些使我們尊重自己的是主要是研究之過程本身，並非來自審稿的通過或出版，這點如果能在政治學界先醞釀，將來或許這個社群真的可以提升，未來我們去向自然科學、經濟學表達立場時，人格立場才能堅定一點。最後，在面對這種吳玉山老師所謂的 iron cage 時，剛剛江宜樺老師是認為要抗拒不參與，而我在這裡要表達的知識立場其實是比他更激進的，不過，我想我表現的方式可能會比他溫和一點，謝謝。

廖達琪所長：

對於這個制度，從以上三位老師中，我們可以看到各自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吳玉山教授是表示無奈地接受；江老師則是認為我不跟它玩了，另闢蹊徑；而石之瑜老師向來是最具創意的，表現出一種抗拒，又不抗拒，要合作，又不合作的創造性模糊。而在武林各派的選項都出來之後，現在第四個我們請另一個武林大派，可能比較像丐幫幫主的黃紀教授來說說他的看法。

黃紀教授：

謝謝廖教授。老實說，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準備上午的 presentation，所以今天這個場次我並沒有多做準備，主要是以一種學習的心情來聆聽，因此就簡短的跟大家談談。與在座各位相比，我也不是什麼武林高手，更沒有什麼特別的學術成就，所以，稍微講一些個人經驗。打個比喻，修我課的同學要撰寫 paper 前，我都會把他們請來聊聊，首先我會問他：「你為什麼想寫這個題目？」同學聽到這個問題通常會先楞一下，然後回問：「是你叫我們要交報告的啊！還問幹什麼？」然而我的回應是：「你有沒有想過：是你自己選了這門課，並且選擇寫這個題目的！所以你就必須要先能夠 convince 你自己，然後你才能 convince 別人，你寫這個題目，一定有它背後的動機與問題意識。」

所以，我今天談研究與寫作，沒有什麼太高明的見解，就順著上面這個脈絡去談談。一個研究主題既然是你自己所選擇的，那麼你可以把它寫成一篇文章，也可以是一本專書，而這裡面的一個關鍵其實在於：你能不能把這個研究主題做個階段性的區分。也許有的主題沒有辦法，那麼就必須以一本完整書的形式完成；但我相信對大多數的主題來說，分成階段性的目標，一定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畢竟人的時間與精力都有限，而且這對於滿足你個人對於某個問題的好奇心來說，一點衝突都沒有。例如我個人對投票行為感到好奇，思索之後就把它區分為好幾個層次去談，先探討一個時間點的一致與分裂投票、然後探討幾個時間點的投票穩定與變遷，接著探討選舉結果造成的一致與分立政府、選舉制度的變化與影響，然後再提高到憲政層次的影響…這麼大的一個主題，對任何人來說都無法一次就研究窮盡，所以分階段完成後的心得，就以期刊論文的形式就教於學界社群。

至於身為學者、研究者，有沒有貢獻？成果輝不輝煌？甚至研究有沒有價值？這個都是要受這個社群公評的，就跟各行各業一樣，不是自己說了就算，也不是自認是傳世之作，就可以流傳萬世。的確，學術是良心的事業。但在往昔，它常常是屬於個人的事業，可是現今的情況已經不同，學術變成一個社群共同努力的成果，它既然仰賴各個成員的分工與合作，那麼這個社群自然就得發展其評斷的標準，也須有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儘管那個標準會隨時代而有所修正變易，但百變不離其宗的原則就是：既然自己選擇進入了學界，就一定要以此為志業，盡其在我。今天簡單報告到此，謝謝各位。

廖達琪所長：

非常謝謝黃教授，他言談之間也不少語重心長的見解。時間不多，現在開放大家向台上的這些門派來討教。

第一屆台大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校友：

我個人現在於立法院服務，聽了今天的研習會，有些看法供大家參考。第一點，很多老師多在學術象牙塔中從事藏諸名山的事業，但民間卻多半不太關心政治，所以建議各位老師應該將研究推展並轉化為易使民間瞭解的知識，鼓動風潮；第二，政治系的老師應該多運用像陳景峻、許陽明等碩士在職專班同學，經由立法院這個管道去把很多觀點或理念加以落實。

寇健文助理教授：

台上的各位前輩可能是用比較 senior 的角度來看，那麼我現在以比較 junior 的角度來討論一下。第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要升等，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這個制度，所以我們必須接受這個制度，因此，我們會比較關心的是這個制度到底長期來說穩不穩定？譬如 TSSCI 收錄的期刊，如果每年都在變動，很可能我今年投稿一篇 TSSCI 的期刊，等到明年登出來時，它又不算了。所以，這樣遊戲規則不斷在變動，使得我們比較 junior 的學者無所適從。第二個問題是，期刊比專書重要的這個趨勢，是不是穩定的？如果是，那我以後就不寫書了，我只投稿期刊就好，書等我升等到教授有空時再說吧。

廖達琪所長：

我們是不是先請吳玉山教授做回應，謝謝。

吳玉山主任：

就剛才所問的問題，我想知識分子、學者在該講話的時候還要是講話的，不過，即使你以很客觀公正的立場去發言，還是一定會被貼標籤，因為我們有標籤工廠在那裡。另外，針對要不要透過立法院去達成一些理念，我們其實都知道那是最快的方法，但是，那裡同樣大家也瞭解，那裡是相當複雜。而對於健文提出的問題，我認為其實沒錯，這套標準是變動不拘的，只是從國科會每次開會中自然科學那氣焰看來，大方向還是不會變。儘管我覺得很遺憾，因為就社會科學來說，書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流傳知識、保持知識的方式，因此我期盼一個審查人應該要看的是質，如果一個人寫了一本品質很好的專書，應該予以肯定。

江宜樺教授：

回應一下健文提的問題。或許許多人都認為，在還沒有升到正教授之前，講一些理想性的話，這是非常迂腐的。然而，我一直都不這樣想，並且也試著朝那個理想去做看看。我升等至正教授是用兩本書去升等的，因為我不喜歡玩那幾篇幾篇，所以我想衝看看。因此，除非你認定自己一定會陣亡，否則我認為你還是應該去試試看。我們都曾 junior 過，而台灣剛開始推行助副正三級的制度時，大家也都十分擔心那五年一次的續聘，我相信這種事情到現在只有更劇烈而已。舉我們學校為例，許多 senior 也利用很多機會做了不少貢獻，以減輕 junior 在研究、出版、教學上的壓力，包含出書可以有八至十二萬的補助，以及積極推動要修正這種兩年一次的不合理評鑑，因為我們都曾年輕過。像國科會這邊，原本 TSSCI 只收二十幾篇，但就我瞭解，經過一些 senior 教授不斷去表示意見之後，今年收錄的期刊數目就增加了一倍。至於要不要透過立法院去做，其實我持的看法跟吳老師一樣，我們都知道那裡很快，但實在會很複雜。

黃 紀教授：

剛才吳老師提到有標籤工廠，其實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也有張 TSSCI 的標籤被貼在額頭上，現在大家一說到 TSSCI，似乎就想到我。那好吧，我個人是沒

有關係，因為如果這樣做可以讓學界進步或是心裡好受一點的話。其實，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當初我們所召集的那個小組會議，其中便有對於專書的寫作做出相關配套機制的討論，因此絕對沒有任何排斥專書或排斥寫專書的老師之意思。所以，當我們在往建立標準這個方向在努力的時候，多多少少有些事情沒有辦法一次盡善盡美地完成，可能很多事要分階段去達成，一步一步做起來，我們希望未來這一不足的部分可以盡快補強。聽說國科會人文處現也努力在為專書建立一個機制，以使同仁的學術成就以經由不同的方式來呈現，這便是個不錯的修正。

廖達琪所長：

謝謝，幾位老師對於學界付出的努力。個人針對於寇健文老師的問題，我也舉個荷蘭畫家林布蘭登的故事來做回應，他的畫被埋在阿姆斯特丹市底下，後來才被人挖掘出來成為國寶。因為他當時身處十七世紀的荷蘭，那時商人地位最崇高，所以每個畫作都是由商人出錢 share，因次每個人的頭都要畫一樣大。林布蘭登嫌這樣的畫法沒有美感，獨樹一幟地把畫裡面呈現出主角(為女性)、配角，而且每個人大小不同，光影明暗紛呈。可是這樣卻因為沒按照商人們的要求，觸怒了他們，後來商人就把此畫長埋於地下，從此不再找他畫，林布蘭登當然也就窮困潦倒一生。舉這個故事，只是想跟年輕的學者說，一個走人煙稀少路徑的人可能要付出代價。當然，這是個人可以選擇的，像林布藍登兩百年後畫被挖出來後竟成為了國寶，所以有人或許也會想選擇成為這樣的人物。今天非常謝謝大家，這場次先就到此結束。

場次四：國內政治學門出版現況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15:50 ~ 17:20 pm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暨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業立（東海大學政治學教授）

與談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系主任）

詹中原（政治大學公行系主任）

劉義周（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蕭全政（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業立教授：

各位政治學界的先進大家好，今天我們政治學出版精進研習會的最後一場討論，本場次將延續前三場的問題或沒有討論到的部分，繼續交換意見。由於這場的主題為「國內政治學門出版現況」，因此所請到的與談人都是國內富有學術期刊或出版等相關編輯經驗優秀學者。首先，從我左手邊開始的是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秀端系主任，主編東吳政治學報，而該學報目前已被納入國內 TSCI；其次是政大公行系詹中原系主任暨教授；政治大學政治系劉義周教授，他同時也做過政大選研中心的主任；最右邊的是台灣大學政治系蕭全政教授，現為政治科學論叢的主編。諸位都非常夠份量，相信可以提供未來學界同仁在出版刊物或投稿期刊時相當多的寶貴意見。現在我們請東吳大學政治系黃主任開始發言。

黃秀端主任：

好，請各位看到投影片的部分，今天我主要跟大家介紹有關期刊的出版概況，目前社會科學分成相當多的學門，收錄在 TSSCI 正式名單中的期刊有二十九種，觀察名單有三十幾種，而其中屬於政治學門的只有兩種，即《問題與研究》，以及《東吳政治學報》，其他的相關名單大家也可以上國科會社科中心的網站去瞭解。有關期刊的投稿，正如上午王德育教授所言，你必須在投稿前瞭解該期刊的屬性，投對稿，目前第三與第四張投影片上所列的大部分都是屬於比較綜合性

的，不論是公行、國關、比政的稿件，其實都可以接受。不過其中像《遠景基金會季刊》、《問題與研究》、《中國大陸研究》、《歐美研究》，可能所接受的稿件就比較要屬國關、兩岸關係，或區域性主題的文章。其實還有許多新的期刊，這我列在第八張投影片，它們也很希望能擠進 TSSCI 的名單之中，只是大概要經過三年的觀察時間。接下來第九頁這張是林繼文老師對各期刊屬性所做的一個統計，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至政治學門期刊在它們內容上的側重屬性，像《空大行政學報》就比較偏重公行，其他也有各領域平均分佈的，如《東吳政治學報》、《政治科學論叢》。

至於針對國科會的這個 TSSCI 對於國內期刊的影響，因為不論是正式或觀察名單，雖然是在形式上符合某種規範，但是它們能入選也與其品質有關，如匿名審查、退稿率等，TSSCI 還是具有其正面意義。大家現在也可以慢慢接受投稿時的審查意見或被退稿，這對早期退稿率不高的情形而言，可說是種進步。我認為這種給予意見是很好的，就算是被退稿，投稿人也可以根據審查意見再把論文更精緻化或再投稿。就我所知國外期刊編輯的情形，像他們通常也會送外審，審稿人都會對論證有無理論基礎，是否嚴謹等等做出批評。而這些國外的外審委員更重視的是論文的原創性，以及對學術有無貢獻，如果沒有的話，一篇很好的文章還是有可能被拒絕。

再看到第十六張投影片，對於量化較質化的研究比較容易被接受，我想那到不見得，主要還是看論文的品質。審查者對實證分析的意見，會相當注重統計資料如何詮釋，該資料與理論的關係為何。假如只是純粹呈現資料，大部分的評審者都會特別批評，或是要求重新思考研究架構與方法等。而質化論文會被特別注意該研究主題的歷史脈絡是否清楚呈現，字眼運用合不合適，即使是純敘述的論文，如果在事件的前因後果上沒交代清楚，會受到嚴厲的批評。另外也有審查者要求質化研究最後起碼做些理論上的意涵分析，或建議加入某些理論。

再者，我們還要很注意學術倫理的問題，因為國內的學術圈事實上很小，一稿多投的情形，很可能還是由那幾個人來負責審查，此外也很浪費資源，一定要切忌避免有這樣的情形。然後，還要瞭解每份期刊的特色，首先必須詳閱所投稿之期刊的稿約，每一期刊的撰稿範例皆不相同，當你決定要將論文投到某一期刊時，也要符合該期刊之稿件格式、圖表、參考文獻等論文體例。

最後，再談談審查的過程，就以《東吳政治學報》的編輯與審查而言，我們初步的審查是對於該稿件是否符合本期刊的主旨做審查，像有時候會有管理學門的文章投來，我們就可能不會受理。其次，再由編委決定外審名單，這當然是完全匿名的審查，比方說兩個人都拒絕，那我們可能就會退稿，如果還有意見，那可能會再送編委來處理，否則外審通常就是決定了一篇文章是否會被接受，我們主編通常都尊重該意見。所以，萬一被退稿的話，還是要再接再厲，不要氣餒。

王業立教授：

謝謝黃主任介紹了這麼多的相關實務經驗，一稿多投的情形是一定要避免的，接下來我相信還有很多有關投稿到刊登出來，或退稿率等問題可供討論，我們繼續請詹中原教授來給大家指導。

詹中原主任：

大家好。政大《公共行政學報》忝列 TSSCI 的觀察名單之一，我們已經感到很榮幸，先從自己的學報講起，本刊創自一九九七年，現在成爲一種常規化的季刊，而目前努力的目標與標準，如果不含再 review、送三審或後續處理上的退稿等等，我們至少一定在三個月內會給投稿人一個 response，就是讓他明白處理情況。本學報兩個主要目標爲定期發行與扮演像 *PAR* 這樣架構，文章首先收有一般性的文章，研究性質的，或 critical issue 這種重大議題的，再者也收 book review，這是我們主要收的四大類文章。

至於在審稿的部分，第一個指標是主題的部分，我們大概第一個是會考量主題的意義，可能是組織、管理、領導這樣比較古典的，大家已經有一定研究基礎的議題；其次則是轉變中的議題，就是從古典意涵在進行轉變的議題，比如以往強調官僚的治理能力，而現在則關注公司部門的合產效果；第三點，這篇文章對於未來的公共行政有著如何的前瞻判斷。而第二個指標則是整個運用的方法，不論是實證、詮釋或批判方法，都有它一定的要遵守的基本規範。第三個指標就是這篇文章的寫作技巧、文法、格式，如早上王德育老師也說過的，大概我們會看你標明的問題，研究的目的，以及使用方法，或對於文獻的回顧。尤其是我常看

到一些量化文章犯的毛病就是以爲 data 出來之後，文章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其實我告訴大家，後面的那些分析與解釋或 conclusion，才應該是文章後百分之五十的開始，而且 conclusion 還要前後相扣才行。

目前編輯的流程上，首先是編委按專業的編組，其次是做匿名的推薦，推薦誰來審，而這編輯委員的相互溝通對於學報品質的提升也很重要。然後講到競爭力，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從華文地區開始發展，比方說將這份學報爭取到在華人地區有像美國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那樣的地位。中國大陸目前正在做的，我想國內也可以參考，它把一篇已經登載期刊文章登陸到《新華文摘》，可能是摘錄或英文，然後再上網，如果有這樣的機制，我想者對於提升文章在國際上的曝光與形象都有正面提升。

最後，我們談談公共行政可以發表的期刊。就以各位手邊拿到的資料所示，與政治學門相關的期刊大該是一百一十五本，其中與公共行政有關的可能只有七個，而真正我們公共行政學者會投的可能不到三個。若再看到黃紀老師在上午所提的這些統計資料中，大該只有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是我們有投過的期刊。資源有時候不一定是錢，很可能是掌聲或是鼓勵，或許公共行政無法向政治學者做那樣宏觀的研究，但是仍應予以公共行政學者一種認可或掌聲，讓跟實務界對話或從事檢證性質的研究可以獲得支持，希望國科會或各位先進在未來也能不吝於給予協助，讓整個公共行政能夠成長的更健全。

王業立教授：

謝謝詹中原教授，那再請政治大學政治系劉義周教授發言。

劉義周教授：

各位學術界的先生女士前輩大家好，先講些題外話，針對前一個場次吳玉山老師提到這種 cage，我感觸也很多，個人過去長期在政大可以說是負責打造這個 publish 之 cage 的人，很多時候對於自然科學的影響力，或者是經濟學在社會科學裡的影響力，實在是感受很深。而這個 cage 一直在變，就像是我們五年五百億的那個過程一樣，它每天都面臨很多的狀況，不過政治學住的只是三星級的 cage，五星級的是屬於理工科或經濟學的，還輪不到我們。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

這種遊戲規則是玩不完的。可是我們也要注意一點，現在的制度雖然沒有針對出專書而給予特別的績效，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因為出專書而被迫退場、補助得不到或升等不過的，絕大部分一定是被大家起立敬禮，被給予掌聲。所以這種 cage 在政治學界應該還可以住啦，我在政大之所以接這個工作的本心也是希望為所有同仁營造一個更良善的學術環境。

首先我想提出討論的是，系所出版刊物是我們的最佳選擇嗎？目前非大學系所出版的期刊有：《台灣政治學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歐美研究》《問題與研究》等；而有出版期刊的系所有：台大政治系、政大公行系、東吳政治系等等。讓人比較困惑的問題在於資源的使用效率，台灣很小，我們需要這麼多人去做這樣資源上的浪費嗎？我建議可以再做有效率的配置；尤其是自己辦刊物，自己投稿，這樣也會有內稿的困擾。因此，我在此提出比較理想的方向應該是；綜合性質的由學會出刊；系所、研究單位負責辦理專業期刊；此外，各期刊都應該提高出版的頻率。

其次，編輯委員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編輯委員在做品管工作應該多元組成，可是事實上有疑義時，要讓所有編輯委員聚在一起實在很困難，編輯委員的任務很重要，但編輯會議的運作又有其難度，因此主編的任務就變得更重要、很辛苦。

第三點，中英文文章並存是不是一個正常現象？常常在一些刊物上會見到這種情形，雖然我當研究生時也曾寫過，但現在覺得不知道寫給誰看？在國內出版文章實在沒有必要去要用英文，我們應該要盡量讓研究結果用中文呈現，使它更便於被多人接受或吸收，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排除英文稿件？鼓勵用英文寫作的文章去投稿國外期刊，這或許是比較適當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期刊基於性質特殊要用英文那當然不在此限，至於有些採一期中文、一期英文的方式來出版，這個當然大家也是可以思考討論其是否必要。

最後，將來台灣的政治學出版刊物如何跟大陸競爭？在台灣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之中，或許政治學門在相較對岸上還有其優勢，但是我不曉得這優勢有多少或還能維持多久。儘管我個人認為簡體字是沒有文化基礎的東西，但沒有辦法，人口因素仍在一門學科的發展上有其重要性，所以我們的刊物出版上應該要再增加發行簡體字版，當然還要發行網路版，把研究成果推廣出去，發揮影響力，這在台灣政治學出版的精進策略上是很好的選擇。

王業立教授：

謝謝劉義周教授的策略與建議，不過我個人在此也要提醒大家，雖然中文很重要，可是按我們國科會的規定，如果你只是用中文發表的話，是不可能得到所謂「傑出研究獎」。接下來，我們交給台大蕭全政教授。

蕭全政教授：

剛剛劉教授的發言，對於系所有發行刊物的我們聽來，真是心有戚戚焉。因為發行刊物對系所而言，確實是一大壓力。只是，其實台灣許多的學會，自己也往往面臨生存的危機，所以說全部出版責任交給他們來負責，我個人也是持保留態度。而我個人在擔任《政治科學論叢》主編工作以來，經歷很多變革，本刊自一九九〇年創刊以來一直都是半年刊，自去年六月本刊改為季刊。這改變過程中的確面臨許多技術性問題，去年的改版中，本刊已定位以中文為主，發行的對象與整合的社群是整個華人地區，超越以往國內發行的定位，收刊以與政治有關的、具有原創性的文章為主，並要保有一種豐富的多元性。

至於政治科學論叢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則有九位，當中除三位是本系教授以外，其餘六為全部外聘，包含政大外交系、政大政治系、世新行政系、東海的王業立教授、中研院政治學籌備處等都是我們的成員。其他期刊的編輯委員可能只需要推薦審稿名單，但是我們的編委會則是定期召開，像主持人王業立教授就每次都從東海到台大開會，十分辛勞。其中一份稿件兩個人審，如果都沒問題，最快可以兩個月內能確定，但至今能兩位審過的非常少，通常都要第三審。如果第三審綜合判斷後還有意見，編委會將再討論，甚至再請人做第四審，我們的編輯委員會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就退稿路而言，直至最近二〇〇四年，本刊退稿率差不多達六七成，而投稿到出刊，最快應是二到三個月便能有結果，至於拖比較久的，可能是在修改上屬問題比較麻煩的。另外要提出來的是，本刊早期一直居於領導地位，二〇〇四年時甚至是 TSSCI 政治學門中唯一的正式名單，但在經過全面精進改版後，二〇〇五年時竟又變成 TSSCI 的觀察名單，而且我們改版後在台大人文社會科學類的期刊評比中是名列第一。因此，TSSCI 這種評比的起落，實在很難不讓人覺得某些

制度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名與實之間相當不對稱。後來仔細探究下，竟都是強調一些程序性的問題，這是個很奇特的現象。誠如前場次也有人發言所提的，期刊評比的變動不居，使得投稿者在計算積分點數上也無所適從。

最後，在此我還需跟年輕學者強調的是，我相信我們的《政治科學論叢》是最不受那些理論模型或實證研究模型所拘束的，甚至也不受特定領域的限制所束縛，我們對主題、對方法、對角度，並無那種定於一尊、定於一式的方式。去年本刊甚至出版了一篇也許大家認為很奇特的文章，它是一篇由三位大學部學生寫的文章，後來經過老師的指導而投稿，是一篇很後現代的文章。三位作者在寫那篇文章時不過大三而已，儘管登這樣的文章風險是很高的，但本刊對於那篇文章的審稿過程卻是非常嚴謹，絕對可受公評的。因此，我們只管文章是否具有原創性，只要能夠對於政治社群提供一些新的見解，我們都願意對歷史負責，給予機會。

王業立教授：

聽完這四位學者對國內期刊出版上提供的豐富見解的，我相信大家或許心中也有許多想法要提出來討論，現在開放讓與會的各位學界先進提問，先請陳敦源副教授發言。

陳敦源副教授：

我以擔任過政大公共行政學報的執行編輯的一點經驗來問幾個問題，首先，從被審者的角度，是不是助理教授不能審教授的文章？另外，被審者有沒有申訴管道，如果他文章真的沒有被好好審理的話。另外，再看審稿者，往往一份刊物因為入選 TSSCI，所以審稿者對於投稿的文章就有另一種標準來對待，至於未入選為 TSSCI 的文章，就可以比較隨便，因此，我想問，審稿本身是不是也要經過一些訓練？下次台大可能要在辦一場針對審稿人的訓練。至於說到品質問題，比方國會研究，國外已經花了很多年在講故事、講權力關係，所以後來公共選擇才能在這個基礎上發揮，因此，國內研究的品質可能也是要靠階段性的進步。至於 TSSCI 這套指標，我想官僚體系或行政體系總是需要一套在分配資源上比較沒有

爭議的指標，但是這在運用上應該更精緻一點，甚至要避免引起一些年輕或資深學者的代際爭議問題。

陳東升處長：

謝謝。我以前還沒有進國科會的時候也是屬於在台下罵的一群，但現在進入瞭解以後，開始比較可以說是將心比心，剛剛蕭教授所質疑的期刊評比問題，我想其中還是有原因存在，可能是有一期拖刊，或是某部分產生一些爭議。我們也接受到許多強烈的意見，不過 TSSCI 有它的功能，當然，它也有限制，只是我相信它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品質把關。國科會現在其實也希望每個學門能夠發展出一套自己社群之中的評鑑制度，我們從來都不能也無法去要求哪個學門一定要怎麼做，或準備強拿同一標準套住大家，就像是如果認為專書重要，甚至其他的研究表現等等，其實都可以納入參考。各位現在可以上國科會網站去參考一下「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要點」，未來國科會計畫協助出版一百本專書，這些措施主要就是不希望用同種標準來拘束學界。

蘇彩足主任：

今天幾個場次聆聽下來，收穫很多。對於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我雖然從吳玉山、江宜樺老師等人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些許悲觀和無奈，但是由他們在這條路上所表達的理念與執著裡，我也看到了教育工作者的熱情。個人現在出任行政職務，更能體認到自己應有為年輕學術工作者開創理想學術環境，甚至是型塑更好制度的責任，而這也是台大政治系積極協助國科會籌劃此項研習會的緣由所在。我在此特別要感謝各位的蒞臨與參與，有不少中南部未克出席的學術同仁也反映，希望會後能看到這場會議的摘要或實錄，這部分我們一定會對重點做出整理，並把各場次的寶貴經驗登載於網站，以饗諸位學術先進。

王業立教授：

首先要謝謝蘇主任這麼辛苦辦此場會議，我們也瞭解到許多老師可能沒辦法親自來參加，所以在此是不是可以希望國科會未來也能在中南部舉行類似的活

動，讓在這些地區的學者可以比較容易參與。其他的與會來賓還有沒有意見，我們時間不多，可能只能再一位。

王德育教授：

謹提供一些個人在美國二十多年的經驗，儘管美國也有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這樣類似國科會的角色，但其實各個學門的真正標準很大程度都是由該學門的 Association 去制定，而參照整個西方的制度來看，我們會發現這些 Association 或社群對於學術或研究的進展實在是功不可沒，因此我在此想對各政治學門的先進們提出一些呼籲，那就是，如果政治學的 Association 沒有辦法發揮規範作用的話，那麼我們就很難避免外面的規範加進來，以上只是我的一些看法，謝謝各位。

王業立教授：

好，接下來我們就請四位與談人來做回應，先請黃秀端主任。

黃秀端主任：

我想我先針對陳敦源老師的問題來回答，陳老師提到的有關助理教授是不是可以審查教授的文章之問題，這在《東吳政治學報》應該是不存在的，因為既然是匿名審查、外審，則其實投稿人根本不知道是誰做審稿，而且本刊在審稿上是以專業為考量，審查人的職務位階非為決定或影響因素。至於有沒有申訴制度的問題，雖然還沒有規定明確，但投稿本刊的任何過程及結果上若有疑義，都可來申訴，我們是一定會接受並予以處理的。而對於審稿者加以訓練的部分，我知道有些審稿者的確不是很認真，也有些則比較挑剔，所以是良莠不齊。所以我們也在建立自己的名單，由曾經合作中審稿者觀察，找出比較負責任的審稿人。

詹中原主任：

我想現在大家在編期刊的人都十分擔心 TSSCI 名單的起起伏伏，剛剛跟黃教授稍微交換一下意見，好像之後會改成觀察名單取消，全部變成正式名單。關於這部分，我想提出的是，希望可以建立一套明確的指標，讓大家瞭解怎麼下來的，

或是怎樣上去的，而且這個指標應是可以被討論的。剛剛劉教授也有提過，現在華文世界，在政治學門我們仍舊是領先中國大陸的，這種優勢可以利用，而且我們也可以好好結合，藉用大陸出版媒體在國際鎂光所受的關注，把我們的東西先由華文社會，再慢慢往國際上推出去。

劉義周教授：

我在政大負責相關事務時感覺到的就是往往校方交代給系所的一些訊息或任務，雖然講了很多，但最後很多都被扭曲了，剛剛陳敦源老師說對老師要兩年一審，我從來就沒聽說過這樣的資訊，真的不曉得是哪裡聽來的。第二，在政大 TSSCI 從來也就不是升等的門檻，它頂多只是一個獎勵用的指標，目前我還沒有聽說過哪個教授因為這樣升等不過的，甚至在其他的學校也沒有這樣子的情形。在這過程裡我保證沒有任何一個行政人員可以去左右，完全都交由學術社群的專業來做決定，這些儘管講過很多次，在這裡還是要提出澄清。

蕭全政教授：

剛剛陳東升處長說他在還沒進去國科會之前，也算是批評國科會的一員。在此，我相信他的意思絕不會是叫我們進去國科會，然後就不會批評國科會。我比較期盼的是，陳處長進去國科會之後，往後我們就再也不必批評國科會，雖然我們也沒有真正進去過。

關於《政治科學論叢》被從 TSSCI 正式名單的除名，就我的瞭解，主要就是二〇〇二年有一期沒有立即用雙掛號寄送而導致耽擱，但卻影響到二〇〇五年的排名，像這樣用程序的手段來做出處置，而不問內容或實質上任何的指標，我們認為對台大真的很傷。還有，開玩笑，台大是執牛耳的單位，結果自己教授的文章卻不能投在台大的期刊上刊登，實在令人費解。

另外，針對陳敦源教授剛剛提到的國會研究，說到以往是用說故事的，所以現在才會發展出那些模型，感覺好像對於說故事是種含貶義的。說到這裡，我特別要指出，經濟學強調的那種科學化，那在台灣是種荒謬，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Nonsense! 索羅斯來，你們誰有辦法解決？解決台灣經濟問題難道就不需要瞭解整體時空因果脈絡的那種說故事的能力嗎？大家都在發展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模型，這就像是 TSSCI 一樣，so what？經濟學家當總統顧問，so what？這種東西

讓人的肉體跟靈魂是二分的，腦袋沒有辦法去跟腳根配合，學者寫這種理論模型只是爲了求安身立命而已。甚至到最後，所有的投到國際上 SCI 的文章都會變成你去 follow 人家的觀點、模型，而跟你自身的腳跟天下或實存脈絡下的問題一點關連都沒有，如果社會科學的發展卻不能腳踏實地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而只是一些知識性的學問，那還要它幹嘛？我想這部分應該是陳處長需要加以思考的。

王業立教授：

謝謝四位與談人的回應，我們時間已經超出非常多了，今天非常感謝國科會的支持，以及台灣大學政治系主辦，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的協助才使得這場政治學精進研習會順利圓滿，不過，我想很多問題也許是從現在才開始，未來更有賴各位學界同仁的努力，本場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